

目 录

卷首语..... 编 者 (1)

李济深传略..... 李煜平 韩省之 (2)

李济深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姜 平 (18)

忆恩师马君武先生..... 秦道坚 (32)

陈 雄..... 熊征祐 陈大文 (45)

石化龙事略..... 马汉英 石剑雄 (58)

辛亥革命党人甘绍相..... 李文卿 (58)

陈树勋事略..... 陈树训 (61)

陈太龙传略..... 侯雅云 (65)

苏曼、罗文坤烈士传略..... 李 昭 苏德源 (69)

我所知道的关瑞梧教授..... 梁曜南 (82)

张其光传略..... 何 菲 (84)

赵可任生平略述..... 赵绩民 钟杰生 (90)

记何标教授..... 东 木 (93)

谢鼎新事略..... 谢建南 (96)

罗伯璘先生在梧事迹·····	骆阳整理 (99)
彭鸿年·····	黎植魁 (102)
黄泰初事略·····	黎葦梧 (105)

填 白

陈良佐脱险记·····	(17)
薛觉先在梧州的三次演出·····	(89)
欧阳予倩经梧赴桂林前后·····	(95)
征稿启事·····	(106)

卷 首 语

这一辑文史资料，辑印了十多位已辞世的人物的传略或事略。我们原本有这样的打算，从今年起，陆续辑印几本梧州知名人士事略的专辑，先从民国以来这个时限，把已辞世文职县长以上，武职团长以上，以及具有一定影响或贡献的其他各界近代人物，尽可能写成资料纪录下来，供研究参考。在具体的人物方面，我们认为不应局限梧州（苍梧）籍的人，外籍人在梧州从事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时间比较长一点，或其活动在梧州有一定影响、贡献的，也可收入。料想这对今后进一步研究梧州地方史是会有参考价值的。

本辑所各篇，有的是转载自兄弟单位的历史资料，《忆恩师马君武先生》一文来自海外，其余系作者投寄或我们的组稿。由于来源不同，故体例、写法甚为参差，有的仅书事略而已。本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写好某一个历史人物，殊非易事，这初次的集稿粗糙简陋在所难免，今后我们当刻意谋求充实提高。

编 者

李济深传略

李煜平 韩省之

李济深字任潮，1885年11月6日（农历9月24日）出生于广西苍梧县大坡料神村的农家。据其家谱所载，明朝时其祖先由江苏武进官迁至梧州，后在附近的四化洲落籍，有部分迁往岑溪丁兰，再由丁兰转到料神村。

李济深的家庭业农，祖父炳光、父亲均尚，都以教书为业，远近争相延聘。李济深六岁时，父亲去世，随叔父均良读书，聪明好学，农忙时亦参加劳动。幼年的耕读生活，使他亲身体会贫穷农民的辛勤和疾苦，在幼小的心灵萌发了热爱人民的深厚感情和远大理想。

清光绪27年（1901年），四书五经已无法满足李济深炽热的求知欲望，为了追求新知识，开拓视野，他到梧州中西学堂读书。当时，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入侵，英国染指广西，强行将广西门户——梧州辟为商埠，倚仗特权，鱼肉百姓，他耳闻目睹。于痛心疾首中，逐步意识到亡国之危，皆因清政府的昏庸腐败，决心以太平天国英雄为楷模，拯民水火，用武力推翻清王朝。

一段坎坷曲折的道路

1903年，李济深十八岁时，毅然辞家到广东黄埔陆军中学读书，两年后，转入陆军速成学堂学步兵科，毕业后，先在新军当见习官，后来调到学兵营做排长，和学兵营的邓铿

连长相从甚密，遂成莫逆。几个月后，他又入广东的讲武堂学习一年。正值保定军咨府军官学校招收于军校毕业后任两年军官者予以深造，李济深以成绩优异，在1910年由广东选送到保定军官学校（即后来的北京陆军大学）学习。

在陆大学习期间，辛亥革命爆发。他和校内师生投入反清斗争，破坏保定附近的浏阳河铁路桥，以阻拦清兵南下。翌年李济深到上海，在广东北伐军姚雨平部任作战参谋。参加了固镇、宿州、徐州三次战斗。在一次战斗中，他的坐骑中弹，临危不惧，改用步行督战冲锋，士气激奋，敌军逃遁，粤军三战三胜，使南京革命政权转危为安。南北议和，清帝退位，革命军进驻南京后，广东革命军改编成为一个师，李济深任第四军二十二师参谋长。一九一三年，陆大迁到北京开学，李济深重返陆大学习一年，为第三期毕业生。当时广东在龙济光控制下，李济深鉴于龙在广东的黑暗统治，他与粤籍同学不愿回粤任职，恰值陆大遴选优秀毕业生取代高薪聘用之日本教官，李济深就留校担任教官，并兼军事编辑局编修。

1920年李济深应邓铿之邀到了广州，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军政府，先后任粤军第一师副官长、参谋长等职。

1922年粤军第一师按照孙中山先生原订计划，进行“护法”北伐，取道韶关，直驱江西。正要攻打南昌时，发生陈炯明背叛事件。在这次事件中，陈炯明令其党羽叶举等于6月16日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妄图置孙中山先生于死地，孙中山先生在枪林弹雨中脱险。北伐军为此立即回师广州靖难，援救孙中山先生，李济深回到广东，目睹陈炯明意态骄盈，吃、喝嫖赌，为非作歹，而自己所在的第一师中，与陈炯明关系密切者甚多，认为一师前途暗淡，遂萌发去意。这时孙

中山在上海，派出警卫团团长陈可钰赶到广州，告示李济深一师还有相当作用，要他千万不要离开一师。李济深就遵令留任第一师参谋长。

1923年2月，孙中山返广州重建大元帅府，粤军第一师和其他粤军协同作战，溯江攻克肇庆。李济深升为第一师师长兼该师参谋长，同年7月，孙中山先生特派一师师长李济深兼西江督办。不久，李济深挥师复溯西江而上，占领广西重镇梧州。孙中山先生任他为梧州善后处长。

鉴于连年征战，各级官兵伤亡不少，且部队一再扩编，急需军官，李济深便以西江督办公署名义在肇庆开办西江陆军讲武堂一所。这所培养军事人才的讲武堂为后来的黄埔军校奠定了基础，事后黄埔军校的教官不少均来自李的第一师。这期间，李济深积极扶植新桂系消灭了陆荣廷、沈鸿英两个军阀，阻止了云南军阀唐继尧侵入南宁、梧州，进而统一了广西，为北伐大革命奠定了基础。

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英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干涉和破坏。1924年5月至10月间，香港汇丰银行大买办陈廉伯组织商团武装，企图从南部颠覆广东政府，建立反动的“商人政府”。孙中山先生断然下令解散商团军，粉碎了英帝国主义的阴谋。李济深始终参与其事。

1924年6月，黄埔军官学校正式开学，孙中山先生委任李济深为教练部主任，后升任副校长。次年3月，李济深派出陈铭枢一旅参加第一次东征。8月，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暗杀，李济深回到广州，将与廖案有重大嫌疑的梁鸿楷、许崇智队缴械，不久李济深即升任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

10月，李济深率部参加第二次东征，为第二路纵队司令，配合第一、三路纵队出发，彻底打垮陈炯明，收复东江

全境。接着又转赴南路讨伐邓本殷叛军。时国民政府任李济深为粤桂联军总指挥，几度激战，消灭敌军，后以木帆船渡海，胜利进驻琼州。

1926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李济深留在琼州未能出席。鉴于他三年来，荡平西江、肇庆练兵、统一全桂，黄埔建校、两次东征、平息商团、消灭刘震寰、杨希闵、扫平南路与进军琼州中，战功累累，大会选李济深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以“共产党阴谋异动”，强迫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窃取了第一军的军权，李济深当时任军事委员会参谋部长，对此甚为愤慨，要蒋介石向政府及国民党自请处分，蒋佯装称是。5月，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中提出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等，以限制和打击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领导地位。李济深曾表示反对。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在广州挥师北伐，李济深任北伐军总参谋长，兼第四军军长、国民革命总司令部留守主任，管辖广东七个戒严区，同时负责后勤补给工作，使北伐无后顾之忧。

实际上，北伐战争早于这年5月揭开序幕，李济深派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率陈铭枢、张发奎两个师，会同第七军之一部挺进湖南，以叶挺独立团为先遣队，一路告捷，10月，攻克武汉，赢得“铁军”的光荣称号。9月，李已启程到前方，任攻赣总指挥，带领二、三、四、六、七军在11月攻克南昌。嗣后，他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广州分会主席、广东省主席，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管辖两广、福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李济深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一度迷失政治方向，为蒋利用，在广州参与了清党事件。对此，李后来一直耿耿于怀，深为内疚。

1929年2月，蒋介石为排除异己，收买湖南主席鲁涤平及其部下，并宣称要讨伐李宗仁，战争一触即发，李济深为避免内战，以调停身份赶到南京。在国民党三全大会上，蒋介石借口有人揭发李宗仁图谋不轨，要求国府下令讨伐。李济深力主化干戈为玉帛，因此触怒蒋介石，被蒋扣留南京汤山达四个月之久。后因桂系失败，乃恢复自由。李济深获释后，蒋介石以铨叙部长的职位羁縻他。李不入其彀，去了香港。

“九·一八”事变以后，国难当头，社会舆论纷纷要求停息内战，团结对外。李济深主张蒋介石发布“罪己诏”，召集全国政治人物共商国事。但是，蒋介石不肯发布。1931年12月，李济深任了为期不久的训练总监。

1931年11月底，蒋介石杀害邓演达，李济深等人在《申报》刊登“为发表筹备邓演达同志追悼会启事”，称誉邓“致力于国民革命，艰苦卓绝，任劳任怨，始终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为慰忠魂，拟择吉日追悼”。事前，李济深曾积极参与营救。

“一·二八”淞沪抗日，李济深曾向蒋介石建议把东北义勇军调进关来，以充实淞沪抗日力量。此议在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的军事委员会上通过，孰料下令后，杳无音信。李济深事后方知，蒋暗中派人携信告张学良不要进关。由此李济深更加认清了蒋介石独裁卖国的面目。1932年5月，蒋复起用李济深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自兼司令，希望李与其携手合作，参与反人民的军事“围剿”。李挂冠不就，最后坚决辞职，而进行反蒋的政治活动。

1933年11月，国民党十九路军领导人决定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并号召“全国反帝反卖国政府之革命势力组织革命政府，打倒以南京政府为中心之国民党系统”。得到李济深的赞同。11月22日，福建中华共和人民革命政府成立时，推举李济深为主席，人民革命政府同中共领导的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从而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在这次斗争最后由于蒋介石的政治瓦解与军事进攻和王明的关门主义而告失败，它标志着国民党内部矛盾的公开激化，国民党内爱国民主力量有了新的发展。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李济深和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梅龚彬等出走香港。1935年春，中共派宣侠父到香港工作，与李济深等人密切往来。经过酝酿协商，决定组织反蒋抗日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7月，李济深被选为该同盟主席兼组织部长。同时在香港等地出版宣传反蒋抗日的报纸与刊物。

1936年6月，李济深积极参加“两广事变”进行反蒋抗日，后因蒋桂合流而告终。12月，西安事变发生，李济深拥护中共和国共合作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两次通电呼吁“一切对外，方足挽危亡”，并针对南京亲日派分子何应钦“讨伐”张、杨的主张，要何“顾念大局，收回成命，国家民族，实利赖之”。在这期间，李济深为促成国共两党又一次合作和进行全民族抗战，做了大量的工作。

坚持抗日，坚持与中共合作

“七七”事变后，李济深恳切向蒋介石建议：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对敌。1937年底，李济深到武汉，其时抗日情绪高涨，他在东湖写信给蒋介石，建议邀请毛泽东、

周恩来、冯玉祥等人来到武汉，用以造成全国大好形势；并建议组织最高国防委员会，共商国事。在武汉期间，李济深致力于加强国共合作，从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他曾派人与中共设在长沙的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徐特立同志联系。并向国民党长沙警备司令黄国梁申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道理，收到良好效果，使其停止了对徐老抗日救国工作的干扰。

不久，李济深应蒋介石邀请到重庆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蒋自兼，为了有利于坚持抗日，他主张委员会必须任用抗日的有识之士。这样，周恩来任党政委员会委员，张友渔、高崇民等都在会内任职。李在任职其间，多次发表有关抗战、反对投降的言论。到1940年蒋介石调程潜取代李济深出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发表李济深为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洞悉蒋的“调虎离山”阴谋，但觉得桂林从事抗日活动似较重庆自由，便离开重庆前往桂林上任。

李济深在桂林期间，站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立场。例如，冯玉祥在桂林办了以宣传抗日救国为旨的“三户图书社”，受到李的极力掩护，他下令有关方面不要去搜查刁难。又如，宋庆龄和陈嘉庚等人常募集医药等物资帮助八路军抗日，但在桂林需有办公厅的批示方可通过，他排除阻挠捣乱，尽快批示放行。

1941年，国民党右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皖南事变”。迫使进步文化人士纷纷离桂，桂林的进步文化活动处于低潮。李济深在此严峻形势下，用办公厅所控制的民航班机座位，秘密将中共党员张友渔、夏衍及民主人士邹韬奋、梁漱溟等送往香港。国民党强令撤销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时，周恩来同志电嘱李济深请其给予照顾和方便，他马上

组织人员协助迁移工作，通过陈劭先到省府用汽车把李克农主任从国民党特务包围下的办事处营救出来，送到香港。由于李济深掩护与帮助大批爱国进步人士，支持正义斗争，因而抗日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更使蒋介石恐惧，于1943年12月底，蒋介石另委李济深回重庆当军事参议院院长，多次电促，最后派其子蒋经国来桂相劝，均为李所拒绝。

1944年6月，日寇进攻长沙，衡阳告急。中共及时提出“保卫大西南”的口号。在桂林，李济深支持田汉的建议，出面组织浩大的募捐活动，并亲自带队上街募捐。将所得募捐慰问了在衡阳的国民党军队及八路军，鼓舞了抗日部队的士气。

桂林告急，有人传重庆政府将迁往西康或兰州，有人问任公怎么办？李说：“逃跑总归不是办法，我能往，敌亦能往。万一敌人进犯桂林，我决心留在敌后，与敌周旋。蒋介石不要土地，我们要；他不要人民，我们要和人民一起坚持在敌后斗争，直到胜利。”周恩来同志也希望他回乡进行敌后抗日，于是李济深以养病为名，回到苍梧，以桂南、广东南路为活动范围，组织抗日自卫武装力量，进而占据桂东南。1945年1月，李济深在“南巡”中经岑溪、容县、北流、玉林等地，沿途慷慨陈词，发动民众抗日，虽受蒋介石特务阴谋暗杀的威胁，但他坚持抗战的决心始终未泯，并与中共的东江纵队、郁南抗日民兵武力指挥部密切联系合作。

1945年日本投降以前，李济深与何香凝、蔡廷锴等曾多次酝酿讨论组织政党问题。何香凝表示组织政党仍需保留中国国民党名义，于是便确定发表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草拟了政治纲领和组织章程，经李济深、何香凝同意后，由蔡廷锴、李章达负责，在广州进行筹备，于一九四六

年春成立。推举李济深为主席，发表成立宣言，宣布忠诚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籍此联络各地爱国民主人士，为促进国家和平民主而努力。

1946年3月，李济深到重庆参加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周恩来同志和一些民主人士在广东酒家举行欢迎宴会。冯玉祥在会上称赞李济深是“不把党放在前面，而是把国家人民放在前面”的国民党员，对李济深表示“钦佩”。宴会上，李济深觉察国民党当局的镇压人民与破坏和平、民主的用心，在席间发言中强调“民主前途尚多困难，希望国民党同志履行政协决议，尤望大家继续努力，以求成功”。

一次桂系头目白崇禧在重庆宴请李济深，席间，白请他对时局发表看法，李知道白素有“不惜内战”的主张，便乘机告诫白崇禧说：“如发动内战，你们一定失败”。提出忠告。

当时，国民党之间的和平谈判在进行，但蒋介石在暗中积极发动内战。李济深见此端倪，立即与黄炎培、冯玉祥等人频繁接触，就如何反对内战问题进行商讨，他们想请出孙科牵头，发动民主运动。后因孙科密告蒋介石而未果。

5月，李济深向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表明促进国内和平民主的政治主张，呼吁国民党政府“为百姓着想”，立即“停止内战”，以慰人民对“和平”的殷切之望。

是月底，李济深、冯玉祥、王葆真、谭平山、徐悲鸿联袂乘船由重庆前征南京。李济深在船上指责蒋介石“爱权之心，胜于爱国”的独裁政治，是“领袖第一，实在不民主”。大家一致表示赞同。

李济深到南京后，从事民主运动的爱国人士考虑到蒋介石

石即将发动全面内战，决定推他领导开展反蒋的军事策反活动。李济深打算自去北方一趟联络一些军人，但考虑到当时他任参议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委员，不便随意行动。这时，恰好蒋介石三次电邀他去庐山，李有意与蒋商谈国事，便离宁前往。詎料到了庐山与蒋介石只见两次面，所谈时间甚短，李济深就给蒋写了一封长信劝蒋必须遵守中山先生的政策，为国家民族着想，建设中国，不打内战，蒋见信后不置一语。李济深看到他无意实行民主，遂借口送子出国，离开庐山。行前，曾写诗两首，表达他当时的心情。诗里写道：“万方多难上庐山，为报隆情一往还，纵使上清无限好，难忘忧患在人间。庐山高处最清凉，为恐消磨半热肠，自是生成庸俗骨，从来不惯住仙乡。”

踏上新民主革命的征途

1946年9月，蒋介石积极策划召开国民大会，当时李济深在上海，蒋通过陈诚去拉拢李济深，作为副总候选人，遭李坚决反对，并对此进行了公开揭露和抵制。例如，他对上海各界名流说：“一条路你能走，别人也能走，就是公道，否则，就不是公道。国民党不许共产党讲话，是不公道，是行不通的”。李济深终于没有出席国大，“国大秘书处”电催赴会在先，派人到沪劝驾在后，他不改初衷，原留超然之身，为奔走和平民主出一番力。

1947年春，李济深感到在蒋管区无所作为，以回乡扫墓为名离沪折道赴香港。在香港他多次发表言论，竭力反对蒋介石发动的内战，支持全国人民的正义斗争，给了南京反动政权以沉重打击。

3月，李济深发表公开声明，就当时时局提出“七项意

见”，指斥蒋介石应负祸国殃民毁坏国民党的责任，主张停止内战，重开政协，废除党内独裁者，李的“七项意见”受到了国内外人士的强烈反应。

5月，在中共领导下，蒋管区的广大学生对南京政府展开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规模遍及京、津、沪等许多城市，形成全国性的学生运动洪流。南京当局颁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对学生运动施加镇压。对此，李济深在香港报界发表谈话，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行为，并指责当局：这种不许“知廉耻，自爱自重”的人民起来反抗作法，实是“违理逾分之要求”。

6月，李济深、何香凝发表《致海外同志暨同胞书》，申诉蒋介石“献媚友邦、出卖国家、发动全国内战”，以致“人民有倒悬之痛，国家如垒卵之危”，呼吁“组织名符其实了联合政府”。

10月，李济深就国民党政府封闭民盟事件发表谈话。指出，南京政府“不容许在野党派存在”，无疑是“彻头彻尾暴露其独裁专政的面目”，使世人在明白南京政府标榜的“民主”，是“空的、假的”。

李济深的言论，揭穿了国民党政府的面目，使之十分惊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遂以“勾结共产党、私组军队，诋毁政府、阴谋叛敌、颠覆国家、割据国土”的罪名登报通缉李济深，宣称他曾三次被开除国民党籍（分别于1929年、1933年、1947年），以此作为他一贯“反叛”的佐证。当时，何香凝对记者感慨地说，这对李济深“丝毫无损，因为人民是反对独裁、反对内战的，是爱护他的”。

1947年秋末，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势如破竹，南京政府濒临崩溃。美帝国主义企图将中国制造“南北

朝”的局面，以便东山再起，在美国授意下，宋子文当了广东省主席，十月初，宋派刘航深到港活动，向李济深提出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来“请蒋暂避”、“出国半年”，给李以“主任”的名义，筹开“和平统一会议”，目的是“国共停战，听候处理”。籍以羁绊部分民主人士和西南诸省的地方势力，形成“西南大联合”来阻止革命的胜利，遭到李济深的断然拒绝。11月，宋子文亲往劝说，他义无反顾，不为所动。12月，李济深还函告当时在美国的冯玉祥，要他“注意美国政府对华动向，设法阻止阴谋之发展”。

为了配合这即将胜利的大好形势，在中共南方局建议和支持下，李济深、何香凝等同志在香港集结力量，筹备召开国民党民主派代表大会，以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们撰写密信，托人从香港秘密带给彼时在沪的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陈铭枢等人，密信中提出：“国民党民主派，集中力量，正名领导，对内对外，紧要万分，盼先生等迅速来港，共同策划一切”。

李济深、何香凝等同志经过协商酝酿，对国民党民主派联合起来的基本任务、政治纲领、内外政策等，取得一致意见。便分别由国民党爱国分子组成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及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出面，于1947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生纪念日这天，由李济深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要真正的三民主义，实行三大政策”，号召大家为继承孙中山先生未竟之志而努力。

1947年一月，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及其它国民党民主人士联合一致，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李济深为主席，并通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等四个文件，在《告本党同志》中强调指

出，国民党已变成“众怨之府，万恶之源”，决定从蒋介石私家党分裂出来组成本党，以“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独立、民主与和平”。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成立后，何应钦派其弟到香港与民革接触联系，宋子文到港和李济深会晤。虽都无实质结果，但说明民革的成立，在国民党内部已引起思想波动，起到动摇分化作用，孤立和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4月，南京召开“行宪”的“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李济深以民革主席名义发表声明，不承认南京“国大”及其选出的正副总统，他把南京“国大”比作袁世凯的“筹安会”和曹锟的贿选，并“殆有过之，而无不及”。

5月1日中共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在发布“五一”节口号中，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代表民革和其他民主党派人士一起联名致电毛泽东公开表示响应，指出中共的号召“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并通电海内外，激励国人共同策进。

同年12月，李济深应中共中央的邀请，正积极准备同一些著名爱国人士一起，秘密离开香港奔赴东北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会议。不料香港某小报披露了他即将北上的消息，这给他的离港计划增置诸多困难，因为英美当局与南京“桂系”的头面人物，都抱着“划江而治”的幻想，都希望与设法把他扣住在香港。但他极目前瞩，道路宽阔，为了迎接新的时代到来，他决计北上，做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的积极参加者和支持者。

在中共华南分局的严密安排下，李济深等战胜困难，在1949年1月10日到达沈阳，受到中共及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此行是他一生最明智抉择，是他有生以来跨出的最有意义的一步，经历了多年迂回曲折，终于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12月，李济深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贵党领导中国革命，路线正确，措施允当，符合全国人民大众之需要，乃获今日伟大之成就，无比钦佩”。并倾吐了“秉承中山先生的遗志，勉尽绵薄为争取中国革命之彻底胜利而努力”的志向。

李济深等参观了东北解放区后，到了北平。

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首次会议在毛泽东主席主持下于北平召开。李济深出席了会议。他在致辞中提到：“我们可以顺利地建立一个符合人民愿望的新中国了，这是何等高兴的事！”他表示：“必须加倍振奋精神，认真地、严肃地在毛主席领导下，进行我们的工作！”次日，他在新政协筹备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1949年9月，李济深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同年11月，国民党民主派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会议通过决议，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与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以及其他国民党爱国民主分子，合并成统一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继续被选为主席。